

◆◆解放前后的罗湖桥◆◆

——《大逃港》摘编之二

说起罗湖桥，至少到清代中期，它还只是过河种田的农民用几株树搭起来的“树桥”。清代后期，村人合资修建了石桥。广九铁路修建时，中英双方同意，由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建造铁路桥。桥上设立“出境检查站”。

当时的“出境检查”是怎么回事呢？桥北边的中方有两排低矮的平房，十分简陋，以致你可能误以为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宿舍，但那便是代表着堂堂中华民国实施管理出人境事务的“深圳海关”。当然，平时出人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。“平房海关”面向着罗湖桥，平房中有一个窗口，窗口边贴有一张白纸，白纸上有人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个字：“出入检查”。南来北往的旅客，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，接受“中华民国海关人员”检查。

那年头，细心的检查员，会在行李上按一下，用生理感应一下包中的藏匿；不细心的，看也不看，举着一个大大的红印，在你的证件上“啪”地一声盖了，你便可以“出境”。相对来说，港英方的检查要严格得多，除了检查来者的出境证件外，还要检查行李的重量、皮箱中有没有携带违禁品。

火车过桥则比较麻烦，双方的火车头是不能越过那条红漆分界线的。只能开到红漆线后，一方把火车头卸下来，对方在另一头接上一个车头，把车拉走。

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，边境检查突然放宽了。几乎不需要证件就可放人过关，这是因为：在中国大陆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发生了。

1949年，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打败，仓皇退往台湾。出于对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“害怕”或者“担心”，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，又来不及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大陆百姓，潮水般地涌向罗湖桥，企图避往香港。

如同一夜涨水，1949年的下半年罗湖桥头突然变得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据当时香港的报纸记载，最高峰时，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。共产党政权来得太突然，群众成千上万涌来。港英政府手足无措，生怕香港涨水。怎么才又“人道”，又不会“水浸”呢？

港英警方临时订了个奇怪的“过桥标准”——广东人可以过，非广东人则不可以。港报这样描述“奇怪的标准”：“难民”们牵儿带女、大包小箱地到了罗湖桥。先检查车票，看行李，英方海关人员（不一定是英国人）眼睛膘过来，看看你的皮肤、长相，判断一下像不像广东人。然后问你：“嗨丙到？”（粤语：“去哪里”）如果你能答得上：“嗨烘公。”（“去香港”）那就是广东人，让你过去。要回答不上的，便从队伍中拉出来，推回到桥那边去！

我的堂兄陈秉卓，原国民党的一位军官，就是这样被港英方人员从队伍中拉出来的。过桥受限制了，一些非广东籍的“逃难者”便生出另一些路径来。这也许就产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“偷渡”。我的那位国民党少校堂兄对我这样描述了最早的“偷渡”：



“我不会说广东话，只好离开桥上的队伍往深圳镇里头走。那时罗湖桥边上的街道两边，都搭着一排排的木板房子，说是旅店，专门接纳从内地跑来深圳等候过香港的人。

我有个朋友介绍的朋友住在镇上，他把我领到一间木板房子里头，贴着耳朵告诉我，晚上就在这房子里坐着等，哪儿都别去，会有人来找我的。大约后半夜吧，我看看表，正是三点，听见有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敲门。我把门开了一道缝，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渔民模样的人。也不说话——不过说广东话我也不会懂的。用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然后伸出巴掌，意思是要钱。我按朋友的吩咐，在他手心里按了两根金条，他就把手掌朝门外摇了两下，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。

这简直就像干间谍工作的呀。外头黑黝黝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跟着他，经过了一条好像是铺着石板的街道，又转了几道弯，前面便出现了一片芦苇。穿过芦苇丛，我便听见水声，面前是一条河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深圳河了。好像比现在的河面宽，因为能行船嘛。芦苇也比现在多很多，都遮得看不清人。那人在河边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掌，芦苇里就慢慢穿出一条船来。那人在我背上赶紧拍了两拍，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。我上得船去，还想回头说什么感激的话，他已经把船一推，小船便朝香港那边去了。

船一到河中央，撑船的——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女人——立起身来告诉我，说我没事了。因为水是属港英地界，共产党没法抓你了……我就这样偷渡到了香港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，政府对于罗湖桥如此“放宽”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是同当时毛、周对国内形势的考虑分不开的。20世纪40年代末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，两大阵营相互敌视，几无往来，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“对外走廊”。如何充分利用这条“对外走廊”成为毛、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国大陆财政拮据，粮食、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。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。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。另外，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，放火，杀害共产党干部，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。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，既可节省财政开支，又有利于国内秩序。

所以，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：从罗湖桥放人。从1947年到1950年，究竟有多少所谓的“大陆难民”通过“对外走廊”逃到了香港呢？估计总数达200万人之多。这些人中，有上海、天津资本家，南京、广州的达官贵人。有躲避共产党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绅，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。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，像唐炳源、王云程、荣氏兄弟、邱德根等，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。

50年代，在香港的调景岭和摩星岭的山头上，曾出现大批数里相连的木屋，据说就是大陆逃港者居住的地方。后来很长一段时期，“每年10月10日（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），这里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，成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”。想走的，都走啦。少了分饭吃的，倒是好事。新生的国家，换来了一时的安宁。

